

中国省级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

曹兰州 赵多平 魏小衬

(宁夏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构建测度省域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的方法体系,并利用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的方法体系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对其时空分异和演化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2013—2016年,我国各省域非景区旅游接待发展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区域差异不明显,仅有部分省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②各省域的泛旅游化指数整体较低,泛旅游化发展呈现较低水平,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③4年间,大部分省份的旅游投资收益指数基本处于较低水平,旅游投资收益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以下,空间格局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④旅游就业强度指数显示,2013—2016年各省份旅游就业强度指数整体趋势无明显变化,仅有部分省份出现复杂性波动,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⑤2013—2016年各省域全域旅游发展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各省域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提升较为明显,区域差异不断缩小,上海和北京的全域旅游发展一直保持着高等水平,位居全国前列。4年间全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由“中东部集中”发展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

关键词: 全域旅游; 发展水平; 测度; 方法; 时空演化; 省级

中图分类号: F59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8141(2019)04-0547-09

Study on Measurement and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Comprehensiv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CAO Lan-zhou ZHAO Duo-ping, WEI Xiao-chen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 methodological system for measuring the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province from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level fo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of 31 provinces and analyze comparatively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①From 2013 to 2016, the tourism reception index of non-scenarios in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 was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not obvious. Only some provinces had different degrees of fluctuation. ②The pan-tourization index of each province was low overall, the development of pan-tourism showed a low level,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as a whole showed “high east and low west”. ③In the past 4 years, the tourism investment income index of most provinces was basically at a low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al level of tourism investment income was below the medium level wholly,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showed “south high and low north”. ④The tourism employment intensity index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overall trend of tourism employment intensity index in each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6, and the level of tourism employment intensity development was “high east and low west”. ⑤From 2013 to 2016, the overall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of all provinces showed a volatility. The nat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whole province was more obvious,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continued to shrink. The global tourism developmental level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were high, ranking first in the country. In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global tourism development developed from “central concentr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to “high north and low east” and “high east and low west”.

Key words: global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measure; method; space-time evolution; provincial level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加和交通出行系统便利化的提升,国内旅游人数持续迅猛增长。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全年国内旅游达到50亿人次,人均出

游近4次”旅游已逐渐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旺盛的旅游需求与旅游景区接待单一供给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尤其在现行休假制度的影响下,客流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每逢“黄金周”,景区接待设施严重超载,交通陷入瘫痪,旅游者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国内旅游由大众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转向明显,旅游休闲游憩的边界更加模糊,旅游亚文化圈层不断分化,传统的景点旅游模式已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随着自驾车保有量的迅速激增,自驾游和自助游的比例逐渐增大,导致目前小旅游的发展理念和导向已无法适应旅游休闲度假的大旅游发展趋势。全域旅游模式正是此背景下对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反思和积极建构^[1]。

收稿日期:2019-02-19; 修订日期:2019-03-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261028)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曹兰州(1994-),男,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开发与规划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赵多平(1978-),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规划、旅游规划与管理及旅游经济运行的教学与研究。

2016 年我国首次提出“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确定了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的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2]。通过推行全域旅游模式,推进旅游转型升级,解决旅游供给侧不足,使景区、酒店、交通等在更高水平上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学术界对“全域旅游”这一概念的探讨早于国家战略政策和实践。2013 年,厉新建首次提出“四新”全域发展观和“全八”发展结构图,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得到了广泛的认可^[3];吕俊芳深化了全域旅游的理论基础,拓展了全域旅游发展条件,并以辽宁沿海经济带为案例区进行了具体分析^[4];周家俊、周晓鹏以甘孜州为例,从全域旅游概念、理论、条件等方面分析了甘孜州全域旅游发展的各种限制因素^[5];曾祥辉、郑耀星对永定县发展全域旅游的必要性方面提出了符合当地特色的全新内涵,并从管理机制、产品体系、市场营销、服务四个方面阐述了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5]。后续研究逐渐集中在对全域旅游理念内涵的界定^[4-6]、全域旅游理念在规划方面的应用^[7-9],以及对区域发展模式的探索^[10-13]等方面。通过政界、业界和学界的共同探究,尤其是《旅游学刊》通过设置专题笔谈的形式集中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全域旅游的内涵认知逐渐取得了一些共识:①改变景区单一供给和“门票经济”发展模式,即要改变以景区为主要架构的旅游空间经济系统,构建起以景区、度假区、休闲区、旅游购物区、旅游露营地、旅游功能小镇、旅游风景道等不同旅游功能区为架构的旅游目的地空间系统,推动我国旅游空间域从景区为重心向旅游目的地为核心转型^[14]。②强调全域旅游过程中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以此增加旅游业的就业机会,提升对区域的综合带动效应。③注重全域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协调,提高区域投资对旅游综合收益效果。这些讨论和研究对构建全域旅游的理论研究框架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对这一具有中国特有旅游概念的认知和理论内涵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文献多是从定性描述和对策分析两个角度来探究全域旅游,研究方法多是以定性分析^[15,16]和案例分析为主^[17-19],缺乏基于全域旅游内涵的定量对比研究,鲜有对全域旅游进行客观定量评估的文献。部分省区做了一些全域旅游业绩评估的尝试,如江苏省提出了从综合业绩评价视角,构建了包含 12 项评价因子的全域旅游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探索和规范全域旅游的发展方向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但此类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涵盖过于宽泛,多偏重业绩考核,缺乏系统性构建,并未突出全域旅游的核心发展内涵,如果采用此类评价指标体系,容易导致全国各省区套用“一个模板”,引起各地全域旅游发展千篇一律,失去地方发展特色。因此,亟待从业界和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全域旅游发展内核出发,构建客观的量化评价指标,从横向对比视角强化对各省区全域旅游发展的理性引导。2013 年,儒余股份核心团队结合旅游规划实践,提出

了全民旅游的发展思路,对全域旅游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2014 年,该团队又编制了湖南省汝城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对全域旅游进行了深度剖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随后,吕俊芳、周家俊、周晓鹏、曾祥辉、郑耀星等学者相继补充了全域旅游的发展思想。本文从数据选取上以 2013 年为起始年限,从理论研究层面尝试性地提出非景区接待指数、旅游收益指数、泛旅游化指数和旅游就业强度指数对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并对省域全域旅游时空分异及其演化特征进行分析,以期深化全域旅游的理论研究,科学评价我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为今后的全域旅游分析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对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较少,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评价方法。根据全域旅游的核心内涵和发展理念并结合其验收标准,本文分析认为全域旅游具有很强的空间性,完整的全域旅游水平测度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非景区接待指数:非景区接待指数是指以非景区旅游为目的的旅游人数占旅游总人数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X_i = (P - P_i) / P \dots\dots\dots (1)$$

式中, X_i 为非景区接待指数; P 为旅游业接待总数; P_i 为景区接待总人数。 X_i 取值范围(0—1),值越接近 1,表明景区旅游在区域旅游中的比重越小。

泛旅游化指数:泛旅游化指数是指在单位面积上所拥有的非景区接待旅游人数,反映了区域单位面积上非景区类旅游者的覆盖强度,计算公式为:

$$Q_i = (P - P_i) / S_i \dots\dots\dots (2)$$

式中, Q_i 为泛旅游化指数, Q_i 越大,表明单位面积上非景区旅游人数越多; S_i 为各区域单元面积。

旅游投资收益指数:旅游投资收益指数是指区域旅游业总收入占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反映了区域投资所获取的间接旅游收益效果,计算公式为:

$$K_i = E_i / M_i \dots\dots\dots (3)$$

式中, K_i 为旅游投资收益指数; E_i 为各区域单元旅游业总收入; M_i 为各区域单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旅游就业强度指数:旅游就业强度指单位面积上的旅游就业人数,反映了旅游业发展对区域人口就业的影响效应,计算公式为:

$$Y_i = P_e / S_i \dots\dots\dots (4)$$

式中, Y_i 为旅游就业强度; P_e 为旅游业从业人数。

2.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4—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依照 2014—2017 年《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齐。针对缺失数据,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外延法或均值法补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无法获取,故本研究未包含在内。

3 结果与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我国各省区非景区接待指数、泛旅游化指数、旅游投资收益指数、旅游就业强度指数,进一步采用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对2013—2016年各省份全域旅游发展各指数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运用自然断裂法将各指数发展水平划分为高等、中高等、中等、中低等和低等5个水平,得出其空间分布格局,以便更好地分析各省域全域旅游各指数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

3.1 非景区接待发展水平分析

非景区接待指数是指以非景区旅游为目的的旅游人数占旅游总人数的比重。我国各省域非景区接待指数整体上较高,仅有部分省区偏低,区域差异不太明显,见表1。2013—2016年,我国大部分省份的非旅游接待指数基本上处于0.5—0.9之间,说明以非景区为目的的旅游形式是出游目的地的主流,且大部分省份的非景区接待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中部与东部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等省份的非景区接待指数普遍呈下

降趋势,表明西部省区的旅游形式仍以景区旅游为主,而中部与东部省份的旅游形式向非景区旅游即商务、休闲等旅游形式发展。

表1 非景区接待指数

行政区划	非景区接待指数				行政区划	非景区接待指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北京	0.3373	0.4192	0.3949	0.2947	天津	0.7815	0.8206	0.7414	0.7801
河北	0.7556	0.7581	0.7366	0.7559	山西	0.8427	0.8664	0.8698	0.8568
内蒙古	0.7278	0.6307	0.4967	0.5512	辽宁	0.8705	0.8160	0.6965	0.7674
吉林	0.6624	0.7200	0.7452	0.7829	黑龙江	0.6396	0.5596	0.5385	0.5655
上海	0.7614	0.7166	0.7393	0.7133	江苏	0.3346	0.2895	0.2416	0.2441
浙江	0.4631	0.4843	0.4411	0.4058	安徽	0.4643	0.5368	0.5413	0.5637
福建	0.6418	0.6024	0.5694	0.6159	江西	0.5613	0.5632	0.6208	0.6596
山东	0.5503	0.5669	0.4864	0.4521	河南	0.6594	0.7205	0.7452	0.6810
湖北	0.7784	0.7740	0.7628	0.7487	湖南	0.7000	0.6893	0.6744	0.7168
广东	0.7678	0.8176	0.7677	0.4333	广西	0.6744	0.6853	0.6758	0.6333
海南	0.3465	0.4362	0.3816	0.3027	重庆	0.8170	0.8052	0.7781	0.7649
四川	0.6421	0.6257	0.5985	0.5905	贵州	0.8503	0.8195	0.7667	0.7476
云南	0.6920	0.7310	0.6922	0.7587	西藏	0.6902	0.6781	0.7000	0.4062
陕西	0.6008	0.6596	0.6218	0.5791	甘肃	0.5734	0.6254	0.5460	0.5211
青海	0.2698	0.2022	0.1361	0.2005	宁夏	0.4507	0.2836	0.2931	0.1628
新疆	0.3661	0.3943	0.3443	0.3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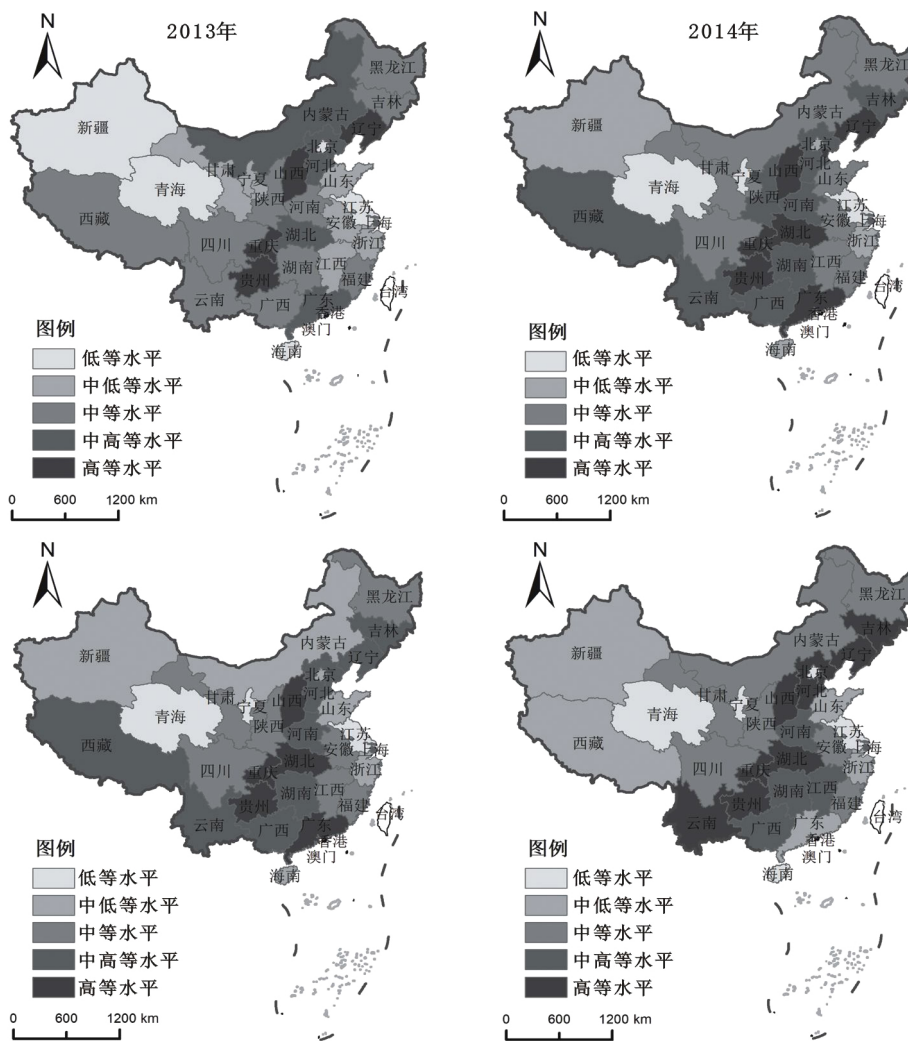


图1 非景区旅游接待指数

从图1可见,各省域非景区旅游接待发展水平总体趋势无明显变化,仅有部分省份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2013年,处于非景区旅游接待发展水平高的省份有辽宁、山西、重庆和贵州,处于中高等水平的省份有内蒙古、天津、湖北、上海等,处于中等水平的有西藏、陕西、河南等,处于中低等水平的有山东、浙江、安徽等,处于低等水平的有青海、江苏和新疆。2014年,非景区旅游接待发展处于高等水平的省份在2013年的基础上增加了湖北和广东,陕西、云南等7个省份的发展水平提高到了中高等水平,而甘肃、山东等4个省份的发展水平从中低等水平提高到了中等水平,新疆的非景区旅游接待指数从低等水平提高到了中低等水平,仅有内蒙古和宁夏的非景区旅游接待指数从中高等水平、中低等水平降到了中等水平和低等水平,其他省份无明显变化。2015年,非景区旅游接待指数整体无明显变化,仅有辽宁从高等降低到中高等水平。2016年,仅有广东、西藏的非景区接待发展水平下降,而大部分省份的非景区接待发展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3.2 泛旅游化发展水平分析

泛旅游化指数是指单位面积上的非景区旅游人数。从2013—2016年泛旅游化指数(表2)来看,泛旅游化指数整体较低,极化程度高,区域差异明显。4年间,上海的泛旅游化指数均最高,指数平均值为3.2186,其次为天津和北京,均值

分别为1.0508、0.5759,而青海和西藏的泛旅游化发展水平最低,均值仅分别为0.0006和0.0009,其他省份的泛旅游化指数普遍处于0.1—0.4之间,区域差异十分明显。2013—2016年我国大部分省份的泛旅游化指数整体出现不同程度的提升,仅有青海和宁夏出现小幅度下降,表明以非景区为目的的旅游形式是当前社会主流。

表2 泛旅游化指数

行政区划	泛旅游化指数				行政区划	泛旅游化指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北京	0.5060	0.6488	0.6488	0.5000	天津	0.9179	1.0929	1.1416	1.3186
河北	0.1087	0.1252	0.1460	0.1881	山西	0.1337	0.1660	0.2009	0.2412
内蒙古	0.0041	0.0040	0.0036	0.0046	辽宁	0.2442	0.2583	0.1573	0.2375
吉林	0.0121	0.0466	0.0562	0.0693	黑龙江	0.0129	0.0131	0.0154	0.0180
上海	3.1413	3.0505	3.2857	3.3968	江苏	0.1696	0.1608	0.1466	0.1618
浙江	0.1439	0.1661	0.1689	0.1696	安徽	0.1117	0.1460	0.1596	0.2118
福建	0.1034	0.1137	0.1254	0.1599	江西	0.0835	0.1050	0.1431	0.1856
山东	0.1942	0.2196	0.2087	0.2087	河南	0.1623	0.1976	0.2311	0.2377
湖北	0.1701	0.1953	0.2093	0.2308	湖南	0.1190	0.1341	0.1506	0.1912
广东	0.2976	0.2989	0.3618	0.0939	广西	0.0693	0.0831	0.0945	0.1097
海南	0.0374	0.0614	0.0599	0.0536	重庆	0.3038	0.3414	0.3706	0.4190
四川	0.0652	0.0698	0.0737	0.0773	贵州	0.1291	0.1496	0.1568	0.2256
云南	0.0451	0.0553	0.0592	0.0853	西藏	0.0007	0.0009	0.0011	0.0013
陕西	0.0754	0.1065	0.1167	0.1265	甘肃	0.0127	0.0173	0.0188	0.0218
青海	0.0007	0.0006	0.0004	0.0008	宁夏	0.0124	0.0072	0.0021	0.0053
新疆	0.0011	0.0012	0.0013	0.0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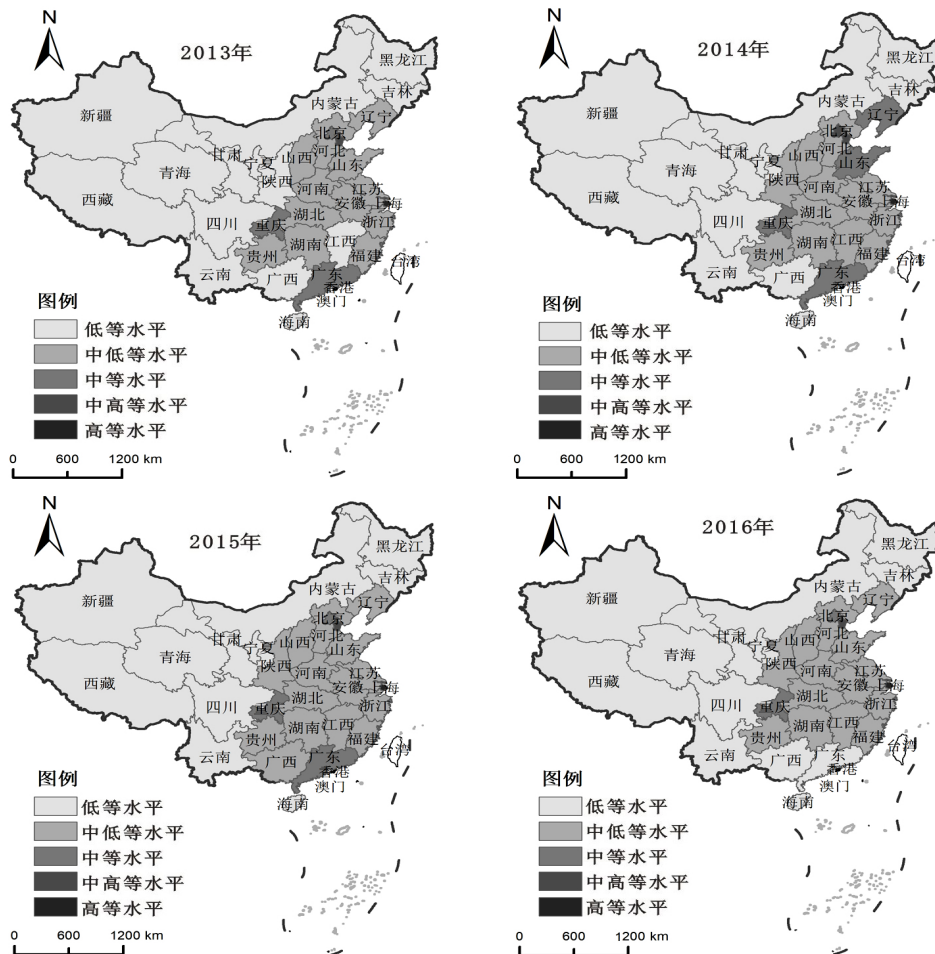


图2 泛旅游化发展水平

表3 旅游投资收益指数

行政区划	旅游投资收益指数				行政区划	旅游投资收益指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北京	0.5636	0.5660	0.5777	0.4306	天津	0.1970	0.2041	0.2139	0.2112
河北	0.0888	0.0979	0.1188	0.2776	山西	0.2058	0.2304	0.2439	0.3032
内蒙古	0.0904	0.1495	0.1597	0.1498	辽宁	0.1788	0.2165	0.2198	0.3326
吉林	0.1423	0.1423	0.2376	0.2337	黑龙江	0.1246	0.0944	0.1177	0.1533
上海	0.5255	0.4903	0.4466	0.3248	江苏	0.1929	0.1892	0.1833	0.2656
浙江	0.2576	0.2675	0.2677	0.1816	安徽	0.1649	0.1614	0.1853	0.3385
福建	0.1473	0.1304	0.2320	0.2115	江西	0.1475	0.1757	0.2136	0.2978
山东	0.1445	0.1489	0.1491	0.2497	河南	0.1478	0.1418	0.2609	0.2711
湖北	0.1551	0.1513	0.1527	0.2415	湖南	0.1459	0.1390	0.1431	0.2590
广东	0.3184	0.3559	0.3451	0.4760	广西	0.1728	0.1880	0.2004	0.3164
海南	0.1572	0.1666	0.1706	0.2334	重庆	0.1581	0.1515	0.1453	0.2320
四川	0.1842	0.2074	0.2266	0.2286	贵州	0.3338	0.3299	0.3278	0.5214
云南	0.2194	0.2407	0.2471	0.2744	西藏	0.1798	0.1822	0.2086	0.3344
陕西	0.1340	0.1347	0.1490	0.2742	甘肃	0.0968	0.1005	0.1131	0.0425
青海	0.0660	0.0694	0.1511	0.2811	宁夏	0.0475	0.0446	0.0945	0.0113
新疆	0.0826	0.0667	0.0972	0.0716					

从2013—2016年泛旅游化发展水平(图2)来看,我国各省域泛旅游化发展呈现较低水平,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东高西低。2013年,仅有上海的泛旅游化发展水平处于高等,中高

等水平只有天津,处于中等水平的有北京、重庆和广东,中低等水平的有辽宁、河北、山东等12个省份,其他省份的泛旅游化发展水平都处于低等水平,中东部省份的泛旅游化发展水平普遍高于西部省份,但差异不大。2014年,泛旅游化发展水平整体趋势无明显变化,仅有辽宁、山东从中低等水平提高到了中等水平,陕西和湖北上升到中低等水平。2015年我国各省域泛旅游化发展水平波动不大,仅有辽宁和山东从中等水平降到中低等水平,广西从低等水平上升到中低等水平。

3.3 旅游投资收益发展水平分析

从表3可见,2013—2016年大部分省份的旅游投资收益指数基本处于较低水平,北京、上海、广东和贵州的旅游投资收益指数最高,处于0.3以上,其他省份均处于0.3以下,宁夏、青海、新疆的旅游投资收益指数仅处于0.1以下。分析发现,4年来大部分省份的旅游投资收益指数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但提升幅度较小,最明显的是西部省份,如西藏、甘肃等,小部分省区的旅游投资收益指数表现出下降趋势,如上海、江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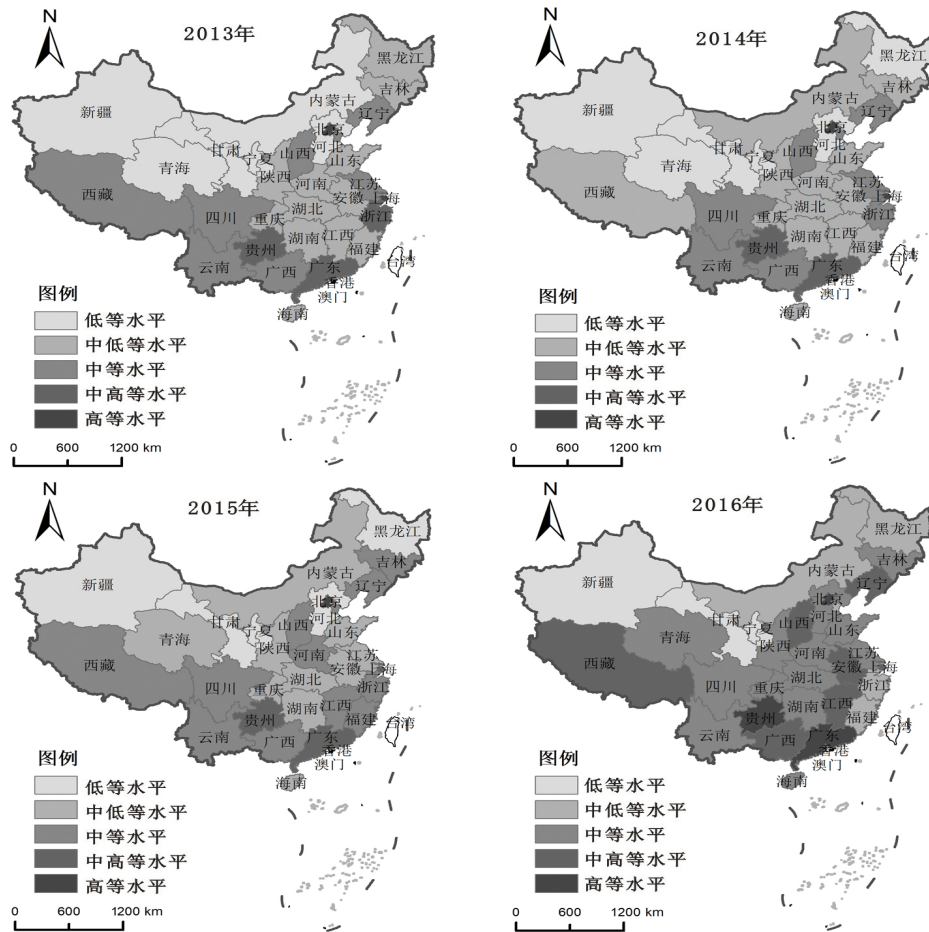


图3 旅游投资收益发展水平

从2013—2016年旅游投资收益发展水平(图3)来看,我国各省域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以下,空间格局呈现南高北低。2013年,旅游投资收益发展处于高等水平的仅有北京和上海,处于中高等水平的有浙江、贵州和广东3个省份,处于中等水平的有江苏、山西等8个省份,处于中低等水平的有黑

龙江、辽宁、山东等12个省份,处于低等水平的有内蒙古、甘肃等6个省份。2014年,各省域旅游投资收益发展水平无明显变化,仅有内蒙古从低等水平上升到中高等水平,而黑龙江从中低等水平降低到低等水平,其他省份无变化。2015年在旅游投资收益发展水平变化中,湖北、福建和河南从中低

等水平提高到中等水平,青海从低等水平提高到中低等水平,而浙江和江苏的发展水平下降了一个层次。2016年,中部省份的旅游投资收益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仅有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如浙江、福建等。2013—2016年中,大部分省份的旅游投资收益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广东、广西等与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等。

表4 旅游就业强度指数

行政区划	旅游就业强度指数				行政区划	旅游就业强度指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北京	9.1304	9.6424	11.3626	8.2699	天津	1.9981	1.9473	1.9744	1.6521
河北	0.4075	0.3449	0.3305	0.3305	山西	0.3574	0.3487	0.4169	0.2402
内蒙古	0.0329	0.0329	0.0302	0.0302	辽宁	0.4290	0.4624	0.3614	0.3523
吉林	0.1334	0.1540	0.1189	0.1170	黑龙江	0.0582	0.0491	0.0476	0.0442
上海	14.1868	14.1375	13.8397	13.8929	江苏	1.3583	1.1658	1.2110	1.2108
浙江	1.1583	1.2592	1.0969	1.0542	安徽	0.4000	0.3718	0.3709	0.4039
福建	0.7703	0.8371	0.7058	0.6636	江西	0.2373	0.2514	0.2468	0.2236
山东	0.8867	0.9318	0.9492	0.7820	河南	0.3659	0.4081	0.3126	0.3343
湖北	0.3410	0.3386	0.3651	0.4019	湖南	0.3636	0.3654	0.3576	0.3562
广东	1.1987	1.0804	1.1180	1.1316	广西	0.2117	0.1851	0.2081	0.3497
海南	1.0559	1.0452	0.9961	1.0296	重庆	0.5874	0.5893	0.5676	0.5422
四川	0.1597	0.1577	0.1337	0.1371	贵州	0.1688	0.1615	0.1634	0.1529
云南	0.2479	0.2633	0.1791	0.1756	西藏	0.0035	0.0052	0.0044	0.0069
陕西	0.2647	0.2662	0.2692	0.3249	甘肃	0.0719	0.0638	0.0646	0.0651
青海	0.0123	0.0186	0.0148	0.0148	宁夏	0.2001	0.1856	0.1863	0.1769
新疆	0.0220	0.0205	0.0204	0.0203					

3.4 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分析

旅游就业强度指数是指单位面积上的旅游就业人数。从表4可见,2013—2016年各省份旅游就业强度指数整体呈现复杂性波动,区域差异十分明显。2013年,旅游就业强度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和北京,分别为14.1868、9.1304,而青海、西藏、新疆最低,分别为0.0123、0.0035、0.0220;2014年最高的仍是上海和北京,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仍处于最低;2015年整体趋势无明显变化。2016年旅游就业强度指数整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仅有个别省份出现下降趋势,如浙江、福建、山东等。

2013—2016年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图4)整体呈东高西低的格局,西部省份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变化,而中部与东部省份的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2013年,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处于高等水平的有北京和上海,天津处于中高等水平,山东、江苏等6个省份处于中等发展水平,而辽宁、河北等11个省份处于中低等发展水平,其他省份都处于低等发展水平。2014年与2013年相比,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无变化。2015年西部省份没有明显变化,而中东部省份发展水平提升较明显,如山东、江苏等5个省份从中等水平提高到了中高等水平,辽宁、河北等8个省份从中低等水平提高到了中等水平,四川、贵州、广西和吉林降低到中低等水平。2016年东部沿海的各个省市的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趋于平稳提升状态,而中西部地区省市由低水平发展为中高等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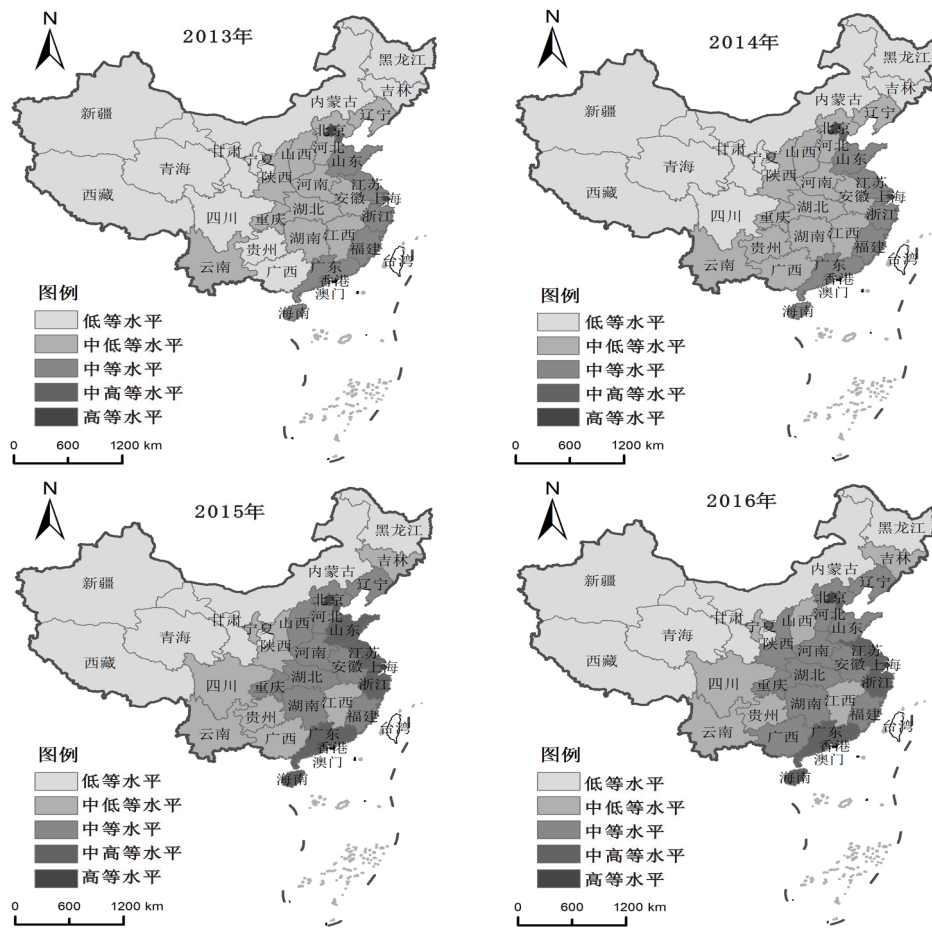


图4 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表5 全域化指数

行政区划	全域化指数				行政区划	全域化指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北京	4.3726	4.6001	4.7200	3.9952	天津	1.3170	1.3488	1.3471	1.1736
河北	0.2785	0.2786	0.2800	0.2584	山西	0.2834	0.2805	0.2828	0.2784
内蒙古	0.0687	0.0605	0.0604	0.0742	辽宁	0.3567	0.3542	0.3531	0.3357
吉林	0.1281	0.1228	0.1245	0.1338	黑龙江	0.0820	0.0753	0.0764	0.0908
上海	7.6768	8.0013	8.0992	6.8498	江苏	0.7157	0.7448	0.7611	0.6645
浙江	0.6300	0.6525	0.6679	0.5977	安徽	0.2475	0.2706	0.2746	0.2594
福建	0.4389	0.4498	0.4581	0.4615	江西	0.1874	0.1855	0.2475	0.1860
山东	0.5204	0.5544	0.5615	0.4805	河南	0.2812	0.2806	0.2813	0.2670
湖北	0.2808	0.2780	0.2779	0.2673	湖南	0.1657	0.2650	0.2670	0.2546
广东	0.7318	0.7497	0.7609	0.6912	广西	0.1798	0.1760	0.2182	0.1833
海南	0.5255	0.5481	0.5638	0.4939	重庆	0.4454	0.4471	0.4457	0.4500
四川	0.1542	0.1495	0.1516	0.1821	贵州	0.2112	0.2031	0.2159	0.2320
云南	0.1927	0.1898	0.2045	0.2027	西藏	0.0616	0.0529	0.0548	0.0809
陕西	0.1974	0.1959	0.2081	0.1934	甘肃	0.0811	0.0757	0.0766	0.0861
青海	0.0286	0.0256	0.0264	0.0351	宁夏	0.1260	0.1256	0.1275	0.1195
新疆	0.0406	0.0365	0.0375	0.0482					

3.5 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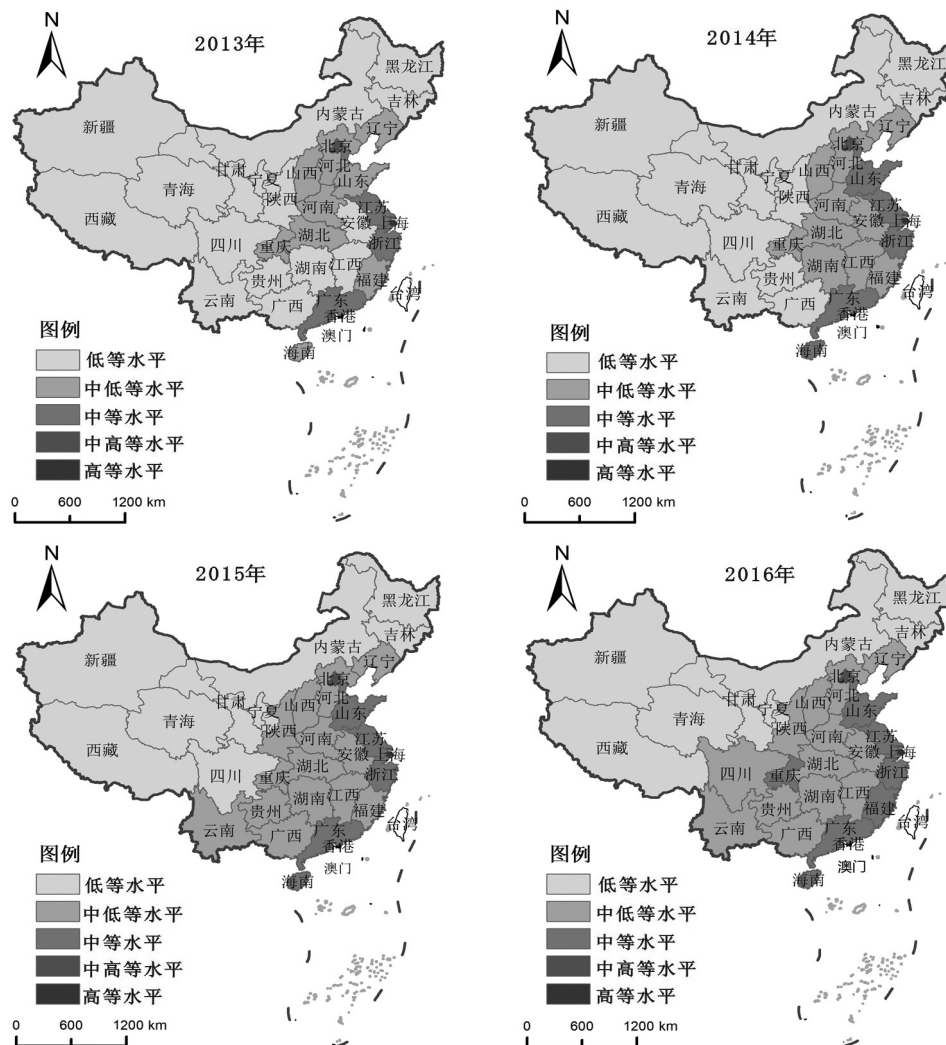


图5 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从图5可见,2013—2016年全国省域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提升较明显,区域差异不断缩小。2013年,全国省域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下水平;2016年,我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等以上水平,仅有西北省份处

于低等水平。4年间,上海和北京的全域旅游发展一直保持着高等水平,位居全国前列;2013年仅有天津、江苏、浙江、广东4个省份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河北、辽宁、山西等9个省份处于中低等水平,其他省份的全域旅游发展

本文对4个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与熵权法得出的指数权重加权求和,最终得出全域旅游综合发展指数,并对其进行聚类划分,进一步通过ArcGIS10.2对2013—2016年各省份全域旅游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图5),以更好地分析我国省域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和主要的演化特征。
从表5可见,2013—2016年我国各省域全域旅游发展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主要集中在中东部省份,仅个别省份呈小范围下降。2013年我国全域化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其值为7.6768,其次为北京,全域化指数为4.3726,青海最低,全域化指数仅为0.0287;2014年上海全域化指数仍旧最高,达到8.0013,青海仍最低;2015年,上海的全域化指数以8.0992仍位居前列,而北京以4.7200位居第二,青海的全域化指数最低,其值仅为0.0264。2016年我国各省域全域化指数比2013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仅有个别省份如宁夏、甘肃等发展不明显。

于低等水平。4年间,上海和北京的全域旅游发展一直保持着高等水平,位居全国前列;2013年仅有天津、江苏、浙江、广东4个省份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河北、辽宁、山西等9个省份处于中低等水平,其他省份的全域旅游发展

水平处于全国低等水平;2014年,上海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仍保持在全国前列,其他省份与2013年相比无明显变化;山东和海南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比2013年有所提升,由中低水平发展为中等水平;2015年,上海和北京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仍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中低等水平的省份与以前相比有明显提升,中等及以上发展水平的省份无显著变化。2016年,福建、重庆、辽宁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由中低等提高到中等水平,四川由低等水平提升到中低等水平,其他省份无变化。4年间全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变化十分明显,2013—2016年不断呈现出沿海地区全域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趋势,尤其是广东、海南发展迅速,然后逐渐向内陆递减。2013年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区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而2016年,我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南高北低和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南部省份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北部省份,东部省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我国各省域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研究层面研究分析提出了非景区接待指数、旅游投资收益指数、泛旅游化指数、旅游就业强度指数等五大指数,并对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通过 ArcGIS10.2 分析了我国全域旅游发展的演化趋势和空间格局,为开展全域旅游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2013—2016年,我国各省域非景区接待发展水平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仅有部分省区偏低,区域差异不太明显,各省域非景区旅游接待发展水平总体趋势无明显变化,仅有部分省份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②从泛旅游化指数来看,各省域的泛旅游化指数整体较低,极化程度高,区域差异明显,泛旅游化发展呈现较低水平,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东高西低”。③2013—2016年,大部分省份的旅游投资收益指数基本处于较低水平,旅游投资收益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以下,空间格局呈现南高北低。④旅游就业强度指数显示,2013—2016年各省份旅游就业强度指数整体趋势无明显变化,仅有部分省区呈现复杂性波动,区域差异十分明显,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不同省域间旅游就业强度发展水平差异大。⑤2013—2016年,各省域全域旅游发展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中东部省份,仅有个别省份出现小范围下降,上海和北京的全域旅游发展一直保持着高等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全国省域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提升较为明显,区域差异在不断缩小,全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由中东部集中发展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南部省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北部省份,并且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各个省市全域化发展水平发展迅速,尤其体现在福建、海南、山东等省市。

本文首次尝试性从理论研究层面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方法体系,然后选取我国31个省市区作为研究区域,用该方法对各省域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演

化进行了评价,由于受到数据缺乏和学术界对全域旅游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的影响,本文提出的几个评价指标也不尽完善,而且对全域旅游的不同理解可能导致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各指标权重的差异;同时关于全域旅游的实践还在探索中,部分指标数据获取难度较大,这在后续研究中还需进一步深化。

4.2 建议

根据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①全域旅游建设需要高要求的顶层设计,需要对区域内经济社会旅游资源全面整合与使用。坚持全域旅游规划引领,整合区域旅游资源,统筹旅游产业布局,科学实施旅游项目策划包装,有序推进旅游项目开发建设,推动旅游产业向全域、全景、全业、全民方向发展。制定全域景区建设标准和服务流程,加强旅游业发展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文化产业、土地利用、环境保护以及农、林、水等规划之间的衔接、协调和融合,推进“多规合一”全域旅游格局,将现代旅游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完善全域旅游发展的制度框架体系,为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升级做好顶层设计。②新的产品、好的业态是全域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力,需要加快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重视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全面整合区域内的经济社会旅游资源,提供高端、人性化、特质化的旅游产品,更新旅游业发展的动力。充分发挥“旅游+”的拉动、融合、催化、集成作用,做好做深全域旅游融合的大文章,多方位、全方面推动农旅、文旅、工旅、商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互带动,不断衍生新产品、新业态、新供给,延长产业链,拓展全域旅游的发展空间,增强产业转型升级功能,满足不同市场、不同群体、不同游客的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旅游需求。③全域旅游的发展需要调动区域内的经济社会等各种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可有效促进全域旅游的发展。围绕全域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加快完善旅游目的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游客集散中心和旅游咨询中心,建立位置科学、布局合理、指向清晰的旅游引导标识体系,推动区域重点旅游景区景务、导览、停车场、厕所等设施的配套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住宿、餐饮、购物、文化娱乐休闲等配套产业,构建区域旅游集散体系、接待服务体系,增强旅游服务功能和承载功能。④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全域旅游发展的关键,需要加强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对旅游人才的培养需要适应新时代旅游发展需求,要着力培养创新型、科技型、复合型旅游人才,培育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水平的战略人才、领军人才、青年人才,要着重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在全域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旅游人才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旅游业,而是涉及到各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如教育、文化、商务、体育等,新的形势对专业旅游人才的需求从数量、质量和结构上提出更高要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行业引导、院校培养的作用,全民协调,培养出适应全域旅游发展所需的旅游人才,为全域旅游发展打造数量充足、素质良好、结构优化的旅游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 [1] 赵慧莎,王金莲.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7 31(7): 176-182.
- [2] 李金早. 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N]. 人民日报 2016-03-04.
- [3] 厉新建,张凌云,崔莉. 全域旅游: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J]. 人文地理 2013 28(3): 130-134.
- [4] 吕俊芳. 辽宁沿海经济带“全域旅游”发展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13 (29): 52-56 64.
- [5] 周家俊,周晓鹏,黄莹. 甘孜州全域旅游的内涵研究[J]. 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5 (10): 99.
- [6] 秦利民,杨静,康璇,等. 发展乡村旅游,建设中国休闲大乡村[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15 17(6): 12-16.
- [7] 樊文斌. “全域旅游”视角下大连旅游专项规划探析[J]. 规划师, 2015 31(2): 107-113.
- [8] 穆克瑞,范贤权,王维,等. 坚持点线面结合推进全域景区化——琼海全域旅游建设的经验及做法[J]. 今日海南 2016 (3): 23-25.
- [9] 吴海琴,张川. 大都市近郊全域旅游型美丽乡村规划探索——以南京市汤山村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15 (11): 74-79.
- [10] 朱竑,贾莲莲. 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桂林案例[J]. 经济地理 2006 (1): 151-155.
- [11] 杨振之. 全域旅游的内涵及其发展阶段[J]. 旅游学刊 2016, 31(12): 1-3.
- [12] 陈凤君,周毅. 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与对策研究[J]. 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6 (3): 21.
- [13] 黄华芝,吴信值. 基于全域旅游视角的兴义市乡村旅游发展探讨[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 27-30.
- [14] 张辉. 全域旅游的理性思考[J]. 旅游学刊 2016 31(9): 15-17.
- [15] 唐烨. 全域旅游视角下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7): 202-207.
- [16] 宋晓丽,周金泉,陈丽琴,等. 全域旅游视域下旅游小镇发展策略探析[J]. 经济问题 2017 (6): 103-107.
- [17] 杨建容. 全域旅游视角下甘孜州智慧旅游路径探析[J]. 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6 (3): 109-111.
- [18] 王磊,刘家明. 宁夏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研究[J]. 宁夏社会科学 2016 (4): 123-127.
- [19] 葛继宏. 全域旅游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杭州淳安县为例[J]. 浙江社会科学 2017 (3): 142-148.
- [15] Patelli L, Prencipe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ary Disclosure and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the Presence of a Dominant Shareholder[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07 16(1): 5-33.
- [16] Elshandidy T, Fraser I, Hussainey K. Aggregated, Voluntary, and Mandatory Risk Disclosure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UK FTSE All-share Companie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13 30(4): 320-333.
- [17] Nekhili M, Hussainey K, Chtioui T, et al. R&D Narrative Disclosur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rket Value: Evidence from Fr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 2015 32(1): 1-16.
- [18] Mohamed A, Schwienbacher A. Voluntary Disclosure of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6 68(3): 69-83.
- [19] 韩鹏,岳园园. 中美企业创新行为信息披露比较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5 35(16): 215-219.
- [20] Lhuillery S. Voluntary Technological Disclosure as an Effici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Device: An Empirical Study[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 New Technology, 2006 15(4-5): 465-491.
- [21] 韩鹏,岳园园. 企业创新行为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16 (1): 49-55.
- [22] Wang Y N, Fan W G. R&D Reporting Methods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2014 8(3): 375-396.
- [23] Chaney P K, Devinney T M. New Product Innovations and Stock Pric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10 19(5): 677-695.
- [24] Lee P. Stock Market Reaction of Disclosure of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R&D Intensity[J]. Journal of The Korea Society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2016 21(11): 151-158.
- [25] Szutowski D. Market Reaction to Open Innovation Announcement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8 21(1): 142-156.
- [26] 赵洪江,王志刚,吴文旭. 我国股票市场对公司创新信息发布短期反应的实证研究——以信息产业和生物制药产业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07 (12): 83-89.
- [27] 冯科,杜微. 企业创新信息披露与中国创业板市场的有效性研究[J]. 新经济 2016 (16): 26-39.
- [28] Zach F, Krizaj D, Mctier B. The Value of Tourism Innovation: The Case of US Hotels[J]. Japanese Circulation Journal 2015 38(11): 431-432.
- [29] Merkley K J. More Than Numbers: R&D - Related Disclosure and Firm Performance[D].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 Works 2010.
- [30] Hopenhayn H, Squintani F. Patent Rights and Innovation Disclosure[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6 83(1): 199-230.
- [31] Boudreau K J, Lakhani K R. “Open” Disclosure of Innovations, Incentives and Follow-on Reuse: Theory on Processes of Cumulative Innovation and a Field Experiment in Computational Biology[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3 44(1): 4-19.
- [32] 刁丽琳,马亚男. 网络效应下企业自愿性创新披露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2 33(8): 44-50.
- [33] Grant S M, Hodge F D, Sinha R K. How Disclosure Medium Affects Investor Reactions to CEO Bragging, Modesty, and Humblebragging[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 Society 2018 (68-69): 118-134.
- [34] 朱朝晖,许文瀚. 管理层语调是否配合了盈余管理行为[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8 (1): 86-98.
- [35] 王华杰,王克敏. 应计操纵与年报文本信息语气操纵研究[J]. 会计研究 2018 (4): 45-51.

(上接第514页)